

# 战后纽约、伦敦和东京 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及其动因

俞文华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国际城市就是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具有竞争优势的城市。国际城市的这种竞争优势,来自它们在银行、金融、保险、咨询、工程、广告、会计等领域提供的优质服务及所发挥的作用。纽约、伦敦和东京是目前举世公认的国际城市。这三大都市不仅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外国银行和从事金融交易的公司,而且也是世界最大跨国公司总部最为集中之地(Hall, 1996, PP. 22),发挥着全球经济管理、经营中心的作用。纽约、伦敦、东京作为国际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可以从表 1 反映出来。

表 1 纽约、伦敦和东京在世界百家最大银行、25 家证券公司全球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中所占比重(%)

	百家最大银行 (1991 年)		25 家最大证券公司 (1991 年)		跨国公司总部 (1997 年)
	总收入	资产	总收入	资产	总数
东京	36.5	45.6	29.6	42.9	9.8
纽约	8.6	8.8	58.6	50.0	12.4
伦敦	4.2	5.7	11.1	4.9	11.4
合计	49.3	60.1	99.3	97.8	43.8

这三大国际都市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城市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对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从时空两方面加以比较分析,并归纳出若干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对我国国际城市的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 一、二战后三大都市经济结构变化及其动因分析

1. 制造业日益衰退,第三产业迅速扩张,生产者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二战后,纽约和伦敦的经济结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结束后不久到 70 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纽约和伦敦的制造业产

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中消费者服务业的部分行业经过一定增长之后也开始下降,而生产者服务业却开始表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但在产值和就业份额上仍未超过消费者服务业。第二阶段是 70 年代中期至今。其特点是,制造业和消费者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生产者服务业在产值和就业份额上超过了传统的消费者服务业。纽约和伦敦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可用表 2 和表 3 分别加以反映。

表 2 1950—1987 年纽约地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

	1950	1960	1970	1980	1987
制造业	29	28.8	20.6	17.4	10.5
建筑业	6	4.1	3.5	2.7	3.3
消费者服务业	40.4	38.7	39.3	39.9	23.8
生产者服务业	25.8	28.3	36.6	40.0	46.1

表 3 1971—1989 年伦敦区就业变化 (千人)

	伦敦区			大伦敦		
	总就业	制造业	生产者 服务	总就业	制造业	生产者 服务
1971	5795	1756	651	3937	1049	520
1978	5679	1425	738	3663	769	560
1981	5562	1263	753	3567	681	568
1984	5513	1106	856	3463	569	631
1987	5630	985	1021	3505	432	753
1989	5692	933	1114	3481	444	793

从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出,纽约、伦敦制造业就业持续下降,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就业持续上升。另据 Ewers 等(1986)对 1951~1981 年伦敦消费者服务业的分析,运输、销售、电力、供水及杂项服务的就业人员,分别从 42.03 万人下降到 37.4 万

人,从 61.74 万人下降到 44.70 万人,从 8.5 万人下降到 4.5 万人和从 61.2 万人下降到 45.1 万人。上述资料均表明,在纽约、伦敦两市的第三次产业内部,消费者服务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而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数持续增加,成为城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动力,并推动着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进而实现第三次产业化。

东京在经历了 1946~1955 年的经济恢复时期,1955~1965 年包括了食品、纺织、印刷出版、化学、金属和钢铁等部门的经济恢复时期,1965~1973 年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和 1973 年以后机械、钢铁、化工等部门增长缓慢并向市外疏散的过程之后,其产业结构也面临着第三次产业化的“质”的飞跃和“量”的变化(表 4),即产业结构向生产者服务业性质的中枢

管理职能转换。首先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即使在整体经济处于萧条的形势下也不例外。第三产业发展中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就业人数和产值始终保持绝对上升态势。1970~1990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上升了近 10 个百分点,比日本平均水平高出 10 个百分点;二是批发、零售、金融、保险以及高级服务业已成为第三产业的主导部门。东京的批发业十分发达,1988 年批发额占日本的 35.2%,比 1960 年上升近 8 个百分点,其中一般商品的批发额占全国 78%。另外,由于企业总部不断向东京集中,为之服务的金融、保险、情报(信息)以及商业服务业迅速发展。1983~1988 年,东京事务所和银行用地面积从 112.9 万平方米扩大到了 281.6 万平方米,增长了近 1.5 倍。

表 4 1970—1990 年东京都就业结构变化表 (万人,%)

年份	总数	第一次产业		第二次产业		第三次产业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1970	567.07	5.93	1.0	220.25	38.1	339.64	59.9
1975	561.99	4.29	0.8	192.85	34.3	361.86	64.4
1980	567.20	3.96	0.7	180.54	31.8	381.86	67.3
1985	600.55	3.75	0.6	178.59	29.7	414.53	69.0
1990	628.41	3.31	0.5	178.66	28.4	438.57	69.8

注:就业总数中还包括不能分类的就业人数。资料来源:《日本城市统计年鉴(1992)年》。

2. 国际金融创新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直接推动了三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70 年代放款是金融市场上份额最大的业务,大商业银行居统治地位。但 80 年代之后,金融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创新,可以转让的信贷和资本票据业务不断扩张,到 1984 年,证券和可转让票据业务超过银行放款业务,在金融市场上份额跃居首位。据统计,1986 年通过投资银行和其他证券筹措的资金为银行借款的 5 倍多(Sassex, 1990)。这一变化使得金融交易的重点由银行放款、信贷转向证券领域,金融业交易总额大大扩张,金融业对其它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

当代电子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降低了信息成本,加快了信息传输速度,大大提高了经营决策效率,“缩短”了空间距离,为企业的决策控制与生产过程区位分离提供了更大的余地,推动了大型公司的发展,并促使它们向全球性城市进一步集结。

上述两因素共同作用,推动这些都市经济进一步全球化。而金融业和管理经营中枢向纽约、伦敦和东京集结的过程本身就是以满足国际化为目的的生产者服务业迅速发展的过程。据统计,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都市在世界范围的投资总额中约占 80%(1986 年数据),在世界最大的百家银行资产中约占 60%,在 25 家证券公司全球机构总资产中占 90%以上,在世界跨国公司总部中所占比例达到 40%以上(见表 1)。这些城市已形成的金融业的强大聚集规模效应,以及能够使证券交易的信息不完全性降至最低,又促使国际金融业务进一步向它们集中。

3. 在城市产业的空间分布上,制造业向郊外迁移,生产者服务业向大都市中心地区集中

纽约和伦敦(东京资料难以取得)的就业结构变化表明,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中心区就业人数的比重迅速增加,而其他部分的就业人数所占比重明显减少。

表5 1984年纽约市各行政区就业结构 (万人,%)

	总计	布朗克斯	布鲁克林	曼克顿	昆士	里士满
各业总计	2953237	5.90	12.38	66.12	14.02	1.89
建筑业	93241	9.56	16.15	41.54	29.06	3.69
制造业	485775	5.01	18.19	58.84	17.25	0.71
服装业	125568	3.05	16.04	69.24	11.07	0.60
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						
批发业	240402	3.78	10.60	55.74	28.07	1.80
零售业	226034	5.78	11.13	68.73	13.50	0.86
零售业	367977	7.85	16.86	52.30	19.16	3.83
金融、保险						
和房地产业	514245	1.97	3.86	89.66	3.93	0.58
商业服务	264317	2.07	4.50	85.67	6.80	0.96
个人服务	31573	7.80	22.11	45.39	20.28	4.42
保健服务	239668	14.98	22.09	39.89	18.14	4.90
教育服务	96073	10.80	14.60	63.10	8.94	2.52

资料来源:Sassen(1991)。

表6 纽约大都会地区(NYMR)的就业分布与区位商

	就业分布 百分比	区位商			
		曼哈顿	其余核 心地区	内环	外环
1956年					
制造业	28.2	68	121	117	128
批发业	6.8	145	83	68	45
金融业	4.8	169	46	68	35
1980年					
制造业	21.5	78	86	111	122
运输业	9.1	102	68	81	71
批发业	5.1	110	94	112	78
零售业	14.1	70	101	114	113
金融业	9.5	195	57	75	62
商业服务	5.9	144	66	95	85
个人服务	2.6	108	104	200	85
专门职业服务	22.1	87	118	97	102
公共行政	4.8	104	117	88	91
NYMR	10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Sassen(1991)。

注1:区位商是指两个数量特征在任何两个地区之间分布所呈现的不同集中或分散程度,从而可以说明两个数量特征在不同地域空间上的专业化程度。区位商就等于 $(X_A/X_B) \div (Y_A/Y_B)$ ,其中,A、B是两个数量特征,X、Y是两个地区。如曼哈顿金融业的区位商=曼哈顿金融业占纽约市金融业就业人数的比重/曼哈顿就业占纽约市就业人数的比重。

注2:纽约有核心区、内环、中环和外环之分。核心(或都心)包括曼哈顿、胡德森(Hudson)、布鲁克林、昆士和布朗克斯;内环包括里奇芒德、伊克塞斯、柏根、派塞克、威斯切斯特、尤里恩和里士满;中环(1956年)包括来德里塞斯、洛克兰德、莫里士、芒冒期、索梅塞特、费菲尔德、舍福尔克、俄林阁、帕特内、杜切斯,1987年为:费菲尔德、米德里塞斯、舍福尔克、梅瑟、纽黑文、洛克兰德、芒冒斯、莫里斯、索梅塞特。1956年只划分了核心(或都心)、内环与中环,1987年的外环包括:里切费尔德、杜切斯、普特纳、尤尔斯特、俄林阁、苏里文、苏塞克斯、瓦伦、杭特丹和奥新县。

表5和表6分别揭示了纽约的制造业、建筑业、消费者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静

动态特征。各行业在曼哈顿集中的情况如下: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简称为FIRE)占89%以上,商业、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的一部分)将近86%。制造业集中的程度虽然低于以往的时间,但仍然高达59%,服装业也较高,达69%。自1970年以来,纽约各区之间各业分布状况变化很小。可是,FIRE和商业服务就业人数在曼顿略有增加,个人、保健和教育服务就业人数在曼哈顿下降较为突出。曼哈顿就业人数最多的领域是FIRE,1985年占职工总数的23.5%,布鲁克林和昆士两个区则以制造业领先,布朗克斯区以保健服务业领先,里士满以零售领先。1970年时,制造业在各区的重要性均胜过现在,尤其是在曼哈顿区,那时制造业职工占该区职工总数的22%,远远大于FIRE所占的17%。同样,制造业职工在布鲁克林几乎占职工总数的40%,在布朗克斯占25%,在里士满占21%。制造业的衰落是纽约市经济基础变化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再从区位商的动态变化来看。表6表明,远在30年以前,曼哈顿FIRE领域就业人数就已有异乎寻常的集中(1956年的区位商是169,1980年为195),而制造业1980年比1956年却有所增加。核心区的其余部分(主要由纽约市以外部分以及新泽西的一个县组成)的金融业区位商大为下降,制造业也逐渐衰落(从1956年区位商的121降为1980年的86)。

1971~1989年,伦敦区制造业、其他生产活动和交通业分别失去70万、11.5万和4万个工作岗位。金融、保险和其他商业服务业则获得了46万个工作岗位,私人消费服务主要在大都市外部获得28万个工作岗位。公共服务在大伦敦外面获得了20万个工作岗位,这主要是该期间制造业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向郊区疏散的结果。1971年至1989年,大伦敦商品生产部门就业从45%下降到29%,金融和生产者服务却由13%上升至23%,伦敦区则从11%上升至19%(Sassen, 1991)。

## 二、经济全球化中三大都市空间重构与人口、社会的空间结构变化

### 1. 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三大都市空间重构

大都市内产业结构及其分布的变化必然导致都市内部空间的重构。一座全球性城市的管理经

营功能增长,在空间方面上则意味着其城区功能和土地使用模式发生变化。为了满足国际性经营管理功能增长的需要,纽约、伦敦和东京都对其大都市中心区进行了重构,并对过去“中心”边缘区进行重新集中规划与建设。生产者服务业的业务功能更集中于都心。

东京都心地区,土地逐渐变为业务用地,住宅日趋减少,夜间人口出现空洞化。以千代田为例,该区白天人口超过100万人,夜间却只有5万多人,因而有碍于城市各种功能的正常发挥。为此,在东京市的第二次长期规划中,提出必须有计划地发展都心及各个充满个性色彩的副都心,并规划了8个不同地区的建设方向。在都心(中央区、千代田区、港区)和副都心地区(文京区、半岛区、新宿区、涉谷区),主要是抑制业务职能的高度集中,将部分业务职能向副都心分散;进行都市职能更新,使金融、信息等功能向高层次发展,银行、商社、新闻机构等要与纽约、伦敦等世界大城市密切联系,交换最先进的情报信息,昼夜不停地开展国际范围的各种活动;进一步繁荣银座、有乐町等有代表性的商业中心,利用外迁工厂旧址建设民宅,修建具有历史、文化气息的步行街,建成一个良好的地区社会生活圈,促使人口回升,使都心地区业务职能和居住职能并存;副都心则要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各种特点,接受都心地区分散的部门职能。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东京在中心区为全球性职能开辟空间,并把中心地带的若干市区作为扩大当地管理职能的空间,把地区性的管理职能从中心市区挪到次中心市区,以及把高技术工业的研究和研制部门置于郊区的过程。

## 2. 经济全球化中大都市人口、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

一般地说来,经济增长部门在大都市中心集中,必然导致高楼大厦林立,高收入人员密集,从而促进豪华住宅的发展,进而排挤低收入居民。上述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与大都市空间重构过程相结合,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过去曾经是城郊性的边沿区、城市的周边区,或称为城市边缘地带,现在已变成了商业密集发展地;二是在这些新的城市中心出现一些新形态的边缘化,且往往与世界上最豪华的商业地段相距不远。

以纽约市为例,纽约市金融和商业服务这两

个部门的显著发展并没有使大部分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明显改善。纽约的个人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为全国的5倍,但收益分配是不均匀的。如在高收入职位中,少数民族所占比重比较低。据1986年的资料,在讲西班牙语的全部职工中,从事管理、专门职业和技术辅助工作的仅占16%,在黑人和其他种族中仅占21%,而在白人则占36%(白人所占百分比因通勤职工未统计在内而偏低)。纽约市职工通勤者虽然只有30%,但90%是白人,其中许多拥有高级职务。少数民族职工从事制造业较多。前曼哈顿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当高,导致这些少数民族人口滞留在大都市中心区边缘,从而形成穷人在市中心边缘而富人在郊区的特殊人口、社会结构。之所以出现这种人口、社会经济结构,是因为,居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以及城市经济的一些其他部门,也需要那些不属于经济核心行业,也没有核心行业吸引力的公司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公司既有专门为特定顾客服务的小型制造商,也有为“工业服务”的行业:仓储、送货服务、卡车维修和包装业等。再者,主导的经济部门和辅助服务也创造了一些低工资的就业岗位,反过来这些人又对低造价住宅和低档次商业提出要求。因此,不论一个城市在新型的全球城市体系中位置多高,它都不免要雇佣大量低报酬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仅收入微薄,而且被认定是或多或少地与一个先进的信息经济社会风马牛不相及的群体。

## 参考文献

- 1 Ewers, Jürgen · Hans, John · B · Goddard, Horst Matzerath, 1986, *The Future of the Metropolis*, Berlin · London · Paris · New York — Economic Aspects, Wavterde Gruyter & Co · west
- 2 Hall, Peter, 1996, *The Global Cit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48, No. 1
- 3 Hall, Peter, 1989, *London 2001*, Unwin Hyman.
- 4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5 Sassen, Saskia, 1991, 纽约市的金融业和商业服务:国际联系和国内效应,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第8卷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本文编辑:魏巍)